



憶列寧

高爾基著 蔣 路譯

時代出版社



“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真
正值得全世界永久紀念的。”

陳烟橋作





列寧和高爾基

• 一九二〇年攝 •

符拉箕米爾·列寧死了。

連他的敵對陣營裏的某些人也老實承認：列寧死後，世界就喪失了『他同時代的一切偉人當中最有天才』的一個。

德國資產階級報紙“Prager Tagblatt”（普拉格日報）刊載了一篇論列寧的文章，字裏行間對這位巨人充滿着敬畏；這篇論文的結語是：

『列寧即使在死了以後也是偉大、不可及和怕人的。』
從文章的語氣可以明白地看出：寫這篇論文的動機並非

由於一種生理上的滿足，如同犬儒主義者的格言所謂『敵人的屍體總是香的』；也不是因為一種舒暢，如同人們在一個大搗亂者離開身邊的當兒所感覺到的；——不，這篇文章裏的確高聲響徹着人對人的誇耀。

資產階級報紙評述這生活意志與堅強理性的最大體現者之一的人格時，倒還表示着敬意，而白俄的報章雜誌却不曾對已死的列寧表示同樣的敬意，他們既沒有這種魄力，也不懂這種禮貌。

描畫他的肖像是很困難的事。在表面上，我們一想到列寧便會記起他那些輝煌的言詞，恰如一想到魚兒便會記起它的閃光的鱗片。他單純而爽直，正像他所說的一切話語。

他的英雄主義差不多完全沒有什麼外露的光芒；他的英

雄主義——這就是俄羅斯所常有的、堅信社會正義可能在大地上伸張的、俄羅斯正直的革命知識份子樸素刻苦的獻身精神；就是捨棄世間一切享樂、爲人類幸福而艱辛工作的人的英雄主義。

他逝世後不久我所寫的關於他的文章，是在沉痛的心情中匆促草率地寫成的。因爲考慮到「禮貌」的關係，有些話我還不便寫出來，我希望讀者能充分諒解我。這人眼光銳利，睿智非凡，然而他的「大智中有大悲在」。

他很有遠見，他在一九一九到二一年考察和談論人的時候，常常毫無差錯地預料了他們幾年以後的情形。人家不一定願意相信他的預言，並且時常爲此生氣，但不幸竟有不少的人證實了他那疑慮之辭。我過去所寫的關於他的回憶錄除

了草率之外，又不連貫，還有許多叫人懊惱的遺漏。我應該從倫敦代表大會講起，當時符拉基米爾·伊里奇屹然挺立在我面前，爲一批人所猜疑和不信任，爲另一批人所公然反對乃至憎恨。

就是此刻，我還分明看見倫敦郊外那座塞酸得可笑的木造教堂的光禿禿的牆壁、和類似窮學校教室的窄小廳堂的披針形窗子。這幢建築物只有外表像教堂，內部却根本沒有做禮拜用的東西，甚至傳教師的矮矮的講壇也不是擺在廳堂後邊的深處，倒擱在進口的兩門之間。

這一年以前我不曾見過列寧，也沒有多讀他的著作，雖說我是應當多讀的。但我所讀過的東西、尤其是跟他直接認

● 指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召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識的同志們的熱情的敘述，都有力地使我嚮往着他。人家介紹我們結識的當兒，他緊緊地握着我的手，用敏銳的眼光盯住我，拿一位老朋友的口吻開玩笑地說：

「您來了，這好極啦！您不是很喜歡吵架嗎？這兒就要展開一場大戰啦。」

我沒料到列寧是這樣的。我覺得他身上缺少什麼東西。他用喉音發着「P」的字音，雙手插在肢窩底下，兩肘向外，站在那兒。總之，他這整個人似乎過於單純，令人覺察不出絲毫「領袖」氣概。我是個文人。職業使我必須去注意一些細微末節，這種「必須」已經成為習慣，有時這習慣是很討厭的。

當有人「引」我去見「B·普列漢諾夫」時，他雙手交

又在胸前，挺立着，嚴厲地、有點膩煩地看着我，彷彿對自己的職務感覺厭倦的教師看一個新學生。他向我講了一句極其平淡的客套：『我對您的天才景仰之至。』除此以外，再也沒有說過使我永記不忘的話了。在整個大會期間，無論他或我都不願互相「談心」。

可是，這個禿頭的、用喉音發着「P」字音的、結實茁壯的人，一隻手摸着那蘇格拉底式的前額，另一隻手拉着我的手，一對靈活得出奇的眼睛親切地閃耀着，立刻就談起了母親這本書的缺點；原來他已經向拉德日尼科夫 (M. I. La-
farsikov) 要來那部草稿，而且讀過了。我說，這本書是匆匆忙忙寫成的，但我還沒來得及解釋匆忙的原因，列寧便同意地點點頭，自行解釋道：你趕寫得正好，這本書是必

須的，許多工人不自覺地、盲目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母親，將會得到很大的益處。

『一本非常合時的書，』這是他給我的唯一恭維語，但在我看來却極其珍貴。接着他又鄭重地詢問，母親是否被譯成了外國文，給俄羅斯的和美國的審查機關刪改了多少；他知道政府業已決定通緝作者之後，他始而皺眉，繼而猛然抬起頭來，閉上眼睛，發出一陣異常的大笑；他的笑聲引起了工人們的注意，走過來的大概是福馬·烏拉爾斯基（Фомы Уралов）和其他兩三個人。

我充滿着愉快的心情，我處在三百位優秀黨員的環繞當中，我知道他們是由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派來出席大會的，我的眼前是黨內所有的領袖，老革命家普列漢諾夫，阿克舍

里羅德^①，傑奇^②等。我這愉快的心情是十分自然的，並且將爲讀者所瞭解，如果我說明了在我僑居國外的兩年間、我所常有的自覺性大大地降低了的話。

自覺性的降低開始於柏林，我在那兒幾乎見過社會民主黨一切最重要的領袖，我在阿古斯特·倍倍爾^③家裏吃過飯，坐在肥頭肥腦的辛格爾^④身邊，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

~~~~~  
<sup>①</sup> 阿克舍申羅德 (H. E. Axcenrode, 1860—1928)，孟什維克派重要首領之一，後來的反蘇份子。

<sup>②</sup> 傑奇 (H. J. Deh, 1855—)，革命家，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成爲孟什維克。

<sup>③</sup> 倍倍爾 (August Bebel, 1840—1913)，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與領袖之一。

<sup>④</sup> 辛格爾 (Singer, 1844—1911)，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們吃飯的地方是一所寬大而舒適的房屋，關金絲鳥的籠子雅緻地罩着繡花布罩，安樂椅靠背上也披着繡花罩子，免得坐在上面的人的頭頸弄髒椅套。四周的一切都很堅實、穩固，大家莊嚴地吃着，莊嚴地互相說：

「瑪勒采特〇。」

我不懂這個字，然而我知道法文的「瑪勒」是「壞」的意思，德文中的「采特」是「時代」，於是變成了「壞時代」。

辛格爾一再稱考茨基為「我的浪漫主義者」。倍倍爾

① 「瑪勒采特」(Mah'zeit)意為「酒罷」。

② 考茨基(Kausky, 1851-)，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後來變成叛徒。

生着一管鷹鉤鼻子，我覺得這人頗爲自滿。我們喝萊茵酒和啤酒，萊茵酒是酸的、溫暖的，啤酒倒挺不錯；他們談起俄羅斯革命與俄國社會民主黨時也是酸溜溜的和輕蔑的，但一談到自己的黨，德國的黨，那末一切都好極了！總之是——一派洋洋自得的神氣，連那些椅子也似乎因爲承受着各位領袖的光榮的軀體而有點飄飄然了。

我跟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有過一件「微妙」的事：一個重要的黨員，就是後來那位大名鼎鼎的巴爾符斯，曾經受

① 巴爾符斯 (Барбус) 是格里方德 (A. Л. Гельфанд, 1869—1924) 的筆名，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九十年代時亡命德國，參加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活動。後來叛變，成了孟什維克。德國革命後脫離政治生涯。

知識社<sup>①</sup>的委託，去向各戲院收集劇本底層的上演稅。他於一九〇二年祕密去塞瓦斯托波爾，在那兒的車站上領取了這份委託書。他所收集的款子該這樣分配：總數的百分之二十歸他，餘款中有四分之一給我，四分之三充作社會民主黨的經費。巴爾符斯自然是知道並且滿意這些條件的。四年當中，這個劇本在德國所有的戲院輪流上演，單只柏林一處便演出過五百次以上，巴爾符斯大約收到了十萬馬克。但他寄給知識社的庇亞特尼茨基（K. I. Pitelkin）的並非現款，而是一封信，他在那信上老老實實地報告說，他跟一位小姐到意大利去旅行了一趟，把全部款子統統花光了。因為這次旅行（無疑是一次異常愉快的旅行）跟我個人有關的僅僅是那

① 知識社（Знание）是高爾基創辦的一個出版社。



筆錢的四分之一，所以我認為自己應該向德國黨中央委員會提出其餘四分之三的款子的問題。我是通過H·D·拉德H尼科夫提出的。中央委員會對於巴爾符斯旅行的事竟漠然視之。後來我纔聽說巴爾符斯被黨方褫奪了某些職權，——憑良心講，我巴不得人家扯掉他的耳朵。再後，當我在巴黎的時候，有人指給我看一位天仙似的小姐或太太，據說她就是巴爾符斯的旅伴。

『我親愛的，』我想，『親愛的。』

我在柏林見過許多作家、藝術家、藝術鑑賞家和旁的人物，他們彼此間的區別，不過是自滿與驕矜的程度不同而已。

① 「親愛的」(Apolonia)又作「昂資的」解，此處爲雙關語。